

《明史、姚廣孝傳（道衍禪師）》之史源、校讀和立場探討

徐一智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提要

姚廣孝曾佐明成祖發起靖難有功，官拜僧錄司左善世、資善大夫及太子少師，於政治上，權傾一時，名動京師，而在佛學研究上，姚廣孝著有《道餘錄》、〈佛法不可滅論〉、《淨土簡要錄》和《諸上善人詠》等書。其中《道餘錄》及〈佛法不可滅論〉論及儒釋道三家，為當時佛教之護教書，並且是研究明代儒釋關係不可或缺的材料；而《淨土簡要錄》和《諸上善人詠》是談論念佛、求生西方等淨土有關之思想，此些著作更是開後世禪淨合一的先河。故姚廣孝實為明初之重要僧侶，對當時佛教界必有深遠的影響，但因其佐靖難之役，及《道餘錄》譏謗先儒（二程及朱熹）為非，終為士大夫們所輕，所以留下來的野史筆記，甚至正史——《明史、姚廣孝傳》中，也指姚廣孝為貪圖權力富貴、不忠不義之人，如此盡書其負面的評價，不僅有違歷史的真實性，（留存史料中，亦有描述廣孝為一個不貪富貴權勢之高僧）就是對姚廣孝而言，亦甚為不公，況且其在政治上，有一定成就外，在佛學研究上，也有其貢獻，故後人在評價姚廣孝時，當應再深思之。

關鍵詞：1.姚廣孝 2.道衍禪師 3.明史 4.明史稿 5.明史列傳

壹、前言

歷來對明代佛教的研究，大都集中於晚明之民間教派興起、居士佛教、三教融合、佛教各宗融合、明末四大師、茹素放生等議題上¹，對於明初的佛教，則較少被提及²，然而歷史的發展，是有其連續性，一個事件，一種思想，絕不會突然產生，故在討論晚明佛教之際，實有必要再注意明初佛教的情況。目前治明初佛教史者，多偏於討論政治與佛教的糾葛³，除此之外，也有少數學者，把研究焦點放在明初之高僧上，希望以其為切入點，詳論當時佛教的變化。姚廣孝（道衍禪師，1335-1418年）即是受注意到者之一，姚廣孝曾佐明成祖靖難有功，官拜僧錄司左善世、資善大夫及太子少師，於政治上，權傾一時，名動京師，而在佛學研究上，姚廣孝著有《道餘錄》、《佛法不可滅論》、《淨土簡要錄》和《諸上善人詠》等書。其中《道餘錄》及《佛法不可滅論》論及儒釋道三家，為當時佛教之護教書，並且是研究明代儒釋關係不可或缺的材料；而《淨土簡要錄》和《諸上善人詠》是談論念佛、求生西方等淨土有關之思想，此些著作更是開後世禪淨合一的先河⁴。故姚廣孝實為明初之重要僧侶，對當時佛教界必有其深遠

¹ 暴鴻昌：〈明季清初遺民逃禪現象論析〉，《江漢論壇》，第三期，1992，pp：57-62。喻松清：〈明清時期民間秘密宗教〉，《歷史研究》，第二期，1987，pp：118-124。慧嚴：〈居士佛教的樣態〉，《中國佛教》，第二十九卷，第六期，1984，pp：33-37。慧嚴：〈明末清初中國佛教的概況〉，《中國佛教》，第二十九卷，第四期，1988，pp：10-17。李利安：〈明末清初禪宗的基本走向〉，《宗教哲學》，第四卷，第二期，1998，pp：155-157。林子青：〈元賢禪師的鼓山禪及其生平〉，收入於張曼濤編《中國佛教史論集六》，台北：大乘，1977，pp：79-89。江燦騰：〈晚明佛教叢林改革與佛學淨辯之研究——以憨山德清的改革生涯為中心〉，台北：新文豐，1990，pp：1-301。釋聖嚴：《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台北：學生，1988，pp：1-484。釋果祥：《紫柏大師研究》，台北：東初，1987，pp：1-78。荒木見悟：《雲棲株宏の研究》，東京：大藏初版株式會社，1984，pp：1-220。釋見暉：〈明末佛教發展之研究——以晚明四大師為中心〉，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pp：1-283。Hsiü Süng-peng(徐頌鵬)：A Buddhist Leader in Ming China: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Han-Shan Te-ch'ing,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Press, 1970, pp: 1-217. Yu Chiün-fang (于君方)：The Renewal of Buddhism in China: Chün-hung and the Late Ming Synthe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345。

² 許淑惠：〈梵琦、道衍的佛教思想及其著作研究〉，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pp：3-15。

³ 毛佩琦：《明成祖史論》，台北：文津，1994，pp：307-360。馬書田：〈明成祖的政治與宗教〉，《世界宗教研究》，第三期，1984，pp：35-51。陳高華：〈朱元璋的佛教政策〉，《明史研究》，第二輯，1992，pp：110-118。樂壽明：〈朱元璋與佛教〉，《學術月刊》，第四期，1983，pp：21-25。暴鴻昌：〈明朝對僧道的管理〉，《北方論叢》，第七十八期，1986，pp：92-96。龍池清著，李孝木譯：〈明太祖的佛教政策〉，收入於張曼濤編《中國佛教史論集》，台北：大乘文化，1977，pp：1-16。釋見暉：〈洪武時期佛教發展之研究——以政策、僧侶、寺院為中心〉，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pp：1-229。曾我部靜雄：〈明太祖六論の傳承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十七卷，第二號，1957，pp：27-36。龍池清：〈明初の寺院〉，《支那佛教史學》，第二卷，第四號，1938，pp：9-29。

⁴ 江燦騰：〈道衍禪師的生平與佛教思想〉，《史原》，第十七期，pp：92-96。商傳：〈明初著名的政治家姚廣孝〉，《中國史研究》，第三期，1984，pp：119-129。牧田諦亮：〈道衍傳小稿—

的影響，以之為切入點，來研究當時佛教界狀況，則是再適合不過，目前學界對姚廣孝的研究，有以下諸篇較具參考價值如江燦騰〈道衍禪師的生平與佛教思想〉、商傳〈明初著名的政治家姚廣孝〉、牧田諦亮〈道衍傳小稿——姚廣孝の生涯〉和 David B. Chan, *The Role of the Monk Tao-yen in the Usurpation of the Prince of Yen* 等⁵。然而在研究姚廣孝的論著中，《明史·姚廣孝傳》是較常被用來論述姚廣孝生平的史料，但是《明史》從清朝設館修書到最後完成，歷經洪承疇（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徐文元（順治十六年進士）、王鴻緒（康熙十二年進士）、張廷玉（康熙三十九年進士）等總領其事，前後歷時九十五年。《明史》修撰時間之所以拖了九十五年，主要原因乃是修史諸臣顧忌太多⁶，清廷修《明史》主要是欲維護正統地位，使自己政權更加鞏固，《明史》修撰者，對明代史上的一些歷史問題，如處理不好，將會觸犯了清廷的忌諱，康、雍、乾時期的幾次大文字獄，就因《明史》的問題引起。除了清廷箝制外，學派門戶之見，亦牽及史書之重大原因，如清廷以朱派學者攻擊陽明之學，致使宗陽明學派者，在《明史》中皆獲不公之評論⁷。因為上列諸因，使《明史》各傳背後，皆存有複雜立場，《明史·姚廣孝傳》亦是如此，所以欲使用其來評價姚廣孝，實在有必要檢查此傳複雜的立場，再加之校讀後，始可為之。

故本文，第一部分便是尋找《明史·姚廣孝傳》的史源。首先依各目錄，如《明史傳記資料索引》、《明代傳記資料叢刊索引》、《千頃堂書目》和《明史·藝文志》等，找尋野史中，有姚廣孝傳者，以此比較各傳，以文字異同找尋史源，後再檢視修史者所呈《脩史條議》，找出佐證，增加僅依文字比較，所找出史源的可信度。

第二部分便是校讀〈姚廣孝傳〉中，因傳抄錯誤或因立場不同之偏激言論。第三部分則以外部環境如政治、時間轉變…等，配合主要史源表現的立場找出《明史·姚廣孝傳》正確之立場意識，進而評價此立場，企圖找出更具現代感及更具現代關懷（人性、大眾關係）的觀點來為傳，故非如現在流行之後現代主義者，主張權力即是知識，企圖改變自己觀點去迎合權貴者，而不考慮史料的整體性。下文則依此三部分逐漸展開討論。

——姚廣孝の生涯〉，《東洋史研究》，第十八卷，第二號，1959，pp：57-79。David B. Chan. "The Role of the Monk Tao-yen in the Usurpation of the Prince of Yen", *Sinologica*, VI, 1959, pp: 83-89。許淑惠：〈梵琦、道衍的佛教思想及其著作研究〉，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pp：73-127。

⁵ 同註4。

⁶ 潘德深：《中國史學史》，台北：五南，1994，pp：366-374。

⁷ 陳守實：《明史考證扶微》，台北：學生，1968，pp：2-34。

貳、《明史、姚廣孝傳》的史源

爲了尋求史源，找出野史裏有多少涉及姚廣孝的傳記，則是必行的工作，因爲撰《明史、姚廣孝傳》者，可能亦據其中之一爲傳，所以筆者依《明史傳記資料索引》和《明代傳記資料叢刊索引》……等目錄，再配合有詳細書目之《明史、藝文志》及《千頃堂書目》去收集各書，底下把找到各書製成表附於下：

表一：明代筆記小說中之〈姚廣孝傳〉

朝代	作者	書名
弘治	黃瑜	《雙槐歲鈔》卷三
正德	王鏊	《守溪筆記》卷三 《震澤紀聞》卷三
嘉靖	顧起綸 鄭曉 郎瑛 朱太韶 唐樞	《國雅品》卷一 《吾學編》卷十 《七修類稿》卷四十三 《皇明名臣墓銘》卷五 《國琛集》卷上
隆慶	田藝衡 鄧球	《留青日札》卷二十七 《皇明泳化類編》卷四十九
萬曆	鄭汝璧 李詔 朱當泗 焦竑 劉鳳	《皇明功臣爵考》卷十 《戒庵老人漫筆》卷三 《靖難功臣錄》卷一 《國朝獻徵錄》卷六 《續吳先賢讚》卷一

萬曆	過庭訓 李贄 沈德符 王世貞 王兆雲 李紹文 錢謙益	《明分省人物考》卷十六 《續藏書》卷九 《萬曆野獲編》卷二七 《名卿續紀》卷三 《明詩評敘》卷一 《弇州山人續稿》卷一四六 《皇明詞林人物考》卷二 《皇明世說新語》卷三 《列朝詩集小傳》閩集
崇禎	幻輪 尹守衡 何喬遠 陳仁錫 張萱	《釋氏稽古略續集》卷三 《皇明史竊》卷四〇 《名山藏》卷五 《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五 《西園聞見錄》卷十四
清代順治	傅維麟 查繼佐	《明書》卷一六〇 《罪惟錄》卷十六
雍正	莊廷鑑	《明史鈔略》卷七十
道光	朱竹垞	《靜志居詩話》卷六
光緒	陳田	《明詩紀事》卷三

《明史》來自王本《明史稿》，王本《明史稿》則是據萬氏《明史稿》而來，張廷玉以王氏《明史稿》爲初稿，於「傳後綴以贊辭」⁸，及「以意更目次」⁹，或「點竄文句」¹⁰而成明史，所以《明史》傳記的文辭已變簡練，且文句稍有更改，在尋找史源，比較各傳文句時，有時《明史》傳記不易看出史源出處，故有必要配合《明史稿》加以參校。其中萬斯同《明史稿》不易見

⁸ 楊農先：〈上明鑑綱目館總裁書〉，劉承幹《明史例案》，收入於楊家駱，《明史》，台北：鼎文，1975，pp：80-84。

⁹ 同註8。

¹⁰ 同註8。

著，關於此問題，筆者以為徐乾學（康熙九年進士）《明史列傳、姚廣孝傳》應和萬斯同（康熙十九年以布衣參明史局）《明史稿、姚廣孝傳》是相同，如楊農先之〈再上明鑑綱目館總裁書〉：

監修徐公，發凡起例，歷十二年而史稿麤就，凡四百一十卷……未幾薨……召左都御史華亭王公於家，與尚書澤州陳文真公為總裁……王公任修列傳，王公延鄞縣萬君斯同，吾邑錢君名世於家，以史事委之……弘正前徐稿考校既疏，乘錯尤甚，萬君無書足信……四十一年冬，熊公來商於諸公，猶以徐稿進呈，上覽之不悅，命交內閣細自看，始萬斯同在時，於徐公傳稿，合者分之，分者合之，無者增之，有者去之……¹¹。

另外《儋園文集、送萬季野南還》：

霜花醪酒送君還，邸舍相依十載間，慣對卷編常病眼，與談忠孝即開顏，折衷三禮宗王鄭，泚筆千秋續馬班，蒲葦獨驅驚歲暮，凍雲寒雪滿江關¹²。

引文即云乾學發凡起例，又云弘正前徐稿考證即疏，可顯示《明史列傳》乃成於乾學領史館時，雖其中云「徐稿考校既疏」、「萬君無書足信」，但後又言萬君分合增損徐稿，如此可知萬氏作傳，亦有參考徐稿，又在〈送萬季野南還〉的詩中，可知徐、萬二君，是時常討論史實，且彼此相處達十年。再進而比較王本《明史稿》和《明史列傳》中之〈姚廣孝傳〉，文句則是相同，故推測《明史列傳、姚廣孝傳》可代萬季野《明史稿》中之〈姚廣孝傳〉。

野史傳記收尋既備，在三版本《姚廣孝傳》互校下，開始收尋《明史、姚廣孝傳》的史源。但檢視《明史、姚廣孝傳》，我們可以發現，傳中內容分成二部分，即是涉及靖難事蹟，和非涉靖難兩部分，涉靖難者，文中只是編年帶過，換個角度而言，亦是在敘述成祖攻擊惠帝的經過，在編年述事，不存在任何立場，及建文朝史料複雜，檢討起來非本文可容納，所以在史源尋找這部分，將有關靖難編年的部分略過。

現在把《明史、姚廣孝傳》的史源列於下：

姚廣孝，長洲人，本醫家子，年十四，度為僧，名道衍，字斯道，事道

¹¹ 同註 8。

¹² 徐乾學：《儋園文集、（一）》，台北：漢華，1971，pp：484-485。

士席應真，得其陰陽術數之學。

按何喬遠《名山藏》〈姚廣孝傳〉：「姚廣孝，其先汴人，扈宋南渡，家長洲之相城，世業醫。」白父曰，不願醫，願仕，不則願出家，因削髮為僧，名道衍，字斯道，相城道士席應真者，傳學明法，兼綜兵略，道衍師之，盡得其機秘……授以占決之術，然深自晦匿也。」

此段當又有參考《國朝獻徵錄》〈資善大夫太子少師贈榮國公諡恭靖姚廣孝傳〉：「姚廣孝長洲人，初為僧，名道衍，字斯道，居相城妙智庵時，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真者，讀書學道兼通兵家言，尤深於機事，廣孝從之執弟子禮，於是盡得其學……。」¹³

嘗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見之曰：「是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流也。」道衍大喜。

按何喬遠《名山藏》〈姚廣孝傳〉：「廣孝目光炬射，形如病虎。」；

此段當又參考《皇明泳化類編》〈姚廣孝傳〉：「先是道衍遊嵩山佛寺，遇珙相之曰，寧馨胖和尚乃爾耶，目三角，影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他日劉秉忠之流也。」¹⁴

洪武中，詔通儒書僧試禮部。不受官，賜僧服還。

按《皇明泳化類編》〈姚廣孝傳〉：「甲寅詔通儒僧出仕，道衍不願仕，賜僧服還山。」¹⁵

經北固山，賦詩懷古。其儕宗泐曰：「此豈釋子語耶？」道衍笑不答。

按《皇明泳化類編》〈姚廣孝傳〉：「至京口（即鎮江）賦覽古詩曰，譙擄年來戰血乾，煙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又詠白花洲云，水濫接橫塘，花多礙舟路，波紅晴曉日，炒白寒西鷺，綠汀漁網集，隔浦菱歌度，不見昔遊人，風煙自朝暮，僧宗泐見其搖膝高吟，笑之曰，此豈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¹⁶

¹³ 焦竑：《國朝獻徵錄》，收入於周駿富《明代傳記叢刊》，第一百〇九輯，台北：明文，1991，pp：219-218。

¹⁴ 鄧球：《皇明泳化類編》，收入於周駿富《明代傳記叢刊》，第八十輯，台北：明文，1991，p.476。

¹⁵ 鄧球：《皇明泳化類編》，p.475。

¹⁶ 鄧球：《皇明泳化類編》，pp：474-475。

高皇后崩，太祖選高僧侍諸王，爲誦經薦福。宗泐時爲左善世，舉道衍，燕王與語甚合，請以從。至北平，住持慶壽寺。

按《名山藏》〈姚廣孝傳〉：「會高后崩，上賜親王名僧，國一人，齋薦高皇后，道衍在燕中大喜，參侍燕王者二十餘年，王禮遇道衍甚厚……甚見親。」

另應有參考〈御製推忠報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公姚廣孝神道碑〉：「洪武十五年，僧宗泐舉至京師，朕皇考太祖高皇帝，一見異之，命住持慶壽寺，事朕藩邸。」¹⁷

又按《實錄本傳》：「洪武十五年僧宗泐薦其學行，命住北平慶壽寺，事上藩邸，甚見禮遇。」¹⁸

及太祖崩，惠帝立，道衍遂密勸成祖舉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論民心。」乃進袁珙及卜者金忠。

按《名山藏》〈姚廣孝傳〉：「建文帝用賢尊士，慕行先王之政，天下皆悅向之，惟道衍數陰說燕王可圖大事，燕王曰，民心悅向，豈瞻烏時耶，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論民心……道衍薦上下者金忠，相者袁珙，皆謂天子也。」

成祖遂決策起兵，適大風雨至，簷瓦墮地，成祖色變。道衍曰：「祥也，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瓦墮，將易黃也。」道衍輔世子居守。

按何喬遠《名山藏》〈姚廣孝傳〉：「道衍謀起兵事……暴風雨簷瓦墜，王不懌，道衍以為祥，王謾罵和尚妄，烏得祥，道衍曰，殿下不聞乎，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瓦墜天易黃屋耳，王喜，出兵，留道衍與燕世子居守。」

成祖即帝位，授道衍僧錄司左善世。永樂二年四月拜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復其姓，賜名廣孝，贈祖父如其官。帝與語，呼少師而不名。命蓄髮，不肯。賜第及兩宮人，皆不受。常居僧寺，冠帶而朝，退仍緇衣。

按何喬遠《名山藏》〈姚廣孝傳〉：「…既即位，授道衍僧錄司左善世，仁宗立為太子，上命淇國公丘福等兼官僚，命道衍太子少師，復其姓，賜名廣孝，被之冠服，予以二宮人，廣孝冠服入謝，削髮如故，二宮人弗近也，

¹⁷ 焦竑：《國朝獻徵錄》，收入於周駿富《明代傳記叢刊》，第一百〇九輯，台北：明文，1991，p.219。

¹⁸ 中央研究院：《明太宗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1981，p.2073。

上益重之。」

另外應又參考《國朝獻徵錄》〈資善大夫太子少師贈榮國公諡恭靖姚廣孝傳〉：「受命，終不蓄髮娶妻，所居多在僧寺，然文皇眷禮彌篤，每稱少師而不名。」¹⁹

出賑蘇、湖，至長洲，以所賜金帛散宗族鄉人。

按何喬遠《名山藏》〈姚廣孝傳〉：「蘇松饑，廣孝奉命出賑。」
另按《神道碑》：「嘗歸吳中，以所賜金帛，悉散之宗族鄉人，其平生，樂善好施，天性然也。」²⁰

重修太祖實錄，廣孝爲監修。又與解縉等纂修永樂大典。書成，帝褒美之。帝往來兩都，出塞北征，廣孝皆留輔太子於南京。五年四月，皇長孫出閣就學，廣孝侍說書。

按何喬遠《名山藏》〈姚廣孝傳〉：「上命學士解縉纂錄文獻大成，猶謂未備，大徵海內文學之士重脩之，自纂脩以及繕寫幾三千人，給與居止膳膏，而廣孝及縉與刑部侍郎劉季荒主其役，歷四寒暑成書凡二萬二千九百卷，賜名永樂大典，久之，皇太孫出閣講學，復命廣孝輔導。」

另按《神道碑》：「朕命儒臣，纂修皇考太祖高皇帝實錄，廣孝為監修官，躬自校閱，克勤所事。」²¹

十六年三月入覲，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慶壽寺。車駕臨視者再，語甚歡，賜以金唾壺，問所欲言。

按何喬遠《名山藏》〈姚廣孝傳〉：「十六年自南京入覲，抵城下，疾不能朝，命從者曰，速為幄，天子至，頃之車駕臨視，撫勞周全，賜金唾壺一，問所欲言。」

另按《神道碑》：「來朝北京，仍居慶壽寺，朕往視之，與語極謹，至二十八日，召諸門人告以去期，即斂袂端坐而逝。」²²

¹⁹ 焦竑：《國朝獻徵錄》，p.220。

²⁰ 焦竑：《國朝獻徵錄》，p.219。

²¹ 同註 20。

²² 同註 20。

廣孝曰：「僧溥洽繫久，願赦之。」溥洽者，建文主錄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為僧遁去，溥洽知狀，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給事中胡濙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繫十餘年。

按何喬遠《名山藏》〈姚廣孝傳〉：「廣孝曰，僧溥洽繫獄久，願赦之，上即坐中出焉，溥洽，山陰人，太祖時以高僧召至，授右講經，歷陞左善世……建文君出之，實溥洽為削髮，靖難兵起為建文設藥師燈懺……詛今上，囚溥洽十餘年，至是以廣孝言得釋。」

尋卒。帝震悼，輟視朝二日，命有司治喪，以僧禮葬。追贈推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榮國公，諡恭靖，賜葬房山縣東北。帝親製神道碑誌其功。

按何喬遠《名山藏》〈姚廣孝傳〉：「數日車駕復幸，問及卒……賜贈廣孝推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進榮祿大夫，上柱國，榮國公，諡恭靖，有司治喪葬，親製碑文墓道。」

另按焦竑《國朝獻徵錄》〈神道碑〉：「即斂袂端坐而逝，享年八十有四，朕聞之哀悼不勝，輟朝二日命有司為治喪葬，追封榮國公，諡恭靖，贈以勳號……乃葬墓在房山縣東北四十里。」²³

官其養子繼尚寶少卿。

按《名山藏》〈姚廣孝傳〉：「道閭門見酒帘書甚工，問誰書也，則一少年，召見之，曰能父我乎，少年曰幸甚，還見上，上賜名繼，以為尚寶卿。」

廣孝少好學，工詩。與王賓、高啓、楊孟載友善。宋濂、蘇伯衡亦推獎之。

按《名山藏》〈姚廣孝傳〉：「道衍善詩詞，古文，與楊基、高啟游。」
另按《實錄本傳》：「道衍嗜學，喜為詩文，少與高啟、楊孟載為莫逆交，朝之縉紳如宋濂、蘇伯珩輩皆獎重之。」²⁴

晚者《道餘錄》，頗毀先儒，識者鄙焉。其至長洲，候同產姊，姊不納。訪其友王賓。賓亦不見，但遙語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復往見姊，姊罵之。廣孝惘然。

²³ 焦竑：《國朝獻徵錄》，p.219。

²⁴ 同註 18。

按《名山藏》〈姚廣孝傳〉：「廣孝有同產姊姚媿，廣孝貴過家拜之，媿避弗內，廣孝披袈裟往，猶弗見，家人強乃出曰，曾見出家不竟名為真僧，遂不再見也，而廣孝故與郡中隱士王賓游，亦避匿之，廣孝屏騎從短褐往大呼曰，先生不忘舊，雅容老僧一會乎，賓曰吾方割楚請為期，未明而往，日出見之，相與再拜，連聲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廣孝恍然退，廣孝嘗著《道餘錄》譏詆宋儒，有楊洪與廣孝厚，燬其書。」

洪熙元年加贈少師，配享成祖廟庭。嘉靖九年，世宗諭閣臣曰：「姚廣孝佐命嗣興，勞烈具有。顧係釋氏之徒，班諸功臣，侑食太廟，恐不足尊敬祖宗。」於是尚書李時偕大學士張璁、桂萼等議請移祀大興隆寺，太常春秋致祭。詔曰：「可。」

按《名山藏》〈姚廣孝傳〉：「仁宗元年……侑享太宗廟，宣德元平置墳戶，世宗九年……侑享太宗廟宣德元年置墳戶，世宗九年詔學士璉，學士萼，姚廣孝佐命嗣興，勞烈具有，顧桑門上首班諸功臣，並食德太二祖側，恐不足尊祖敬宗，非朕靈承宗廟意，卿等加思之，下禮部議，尚書李時議上，臣伏見故少師廣孝，弼輔太宗，雖有帷幄奇謀，穹爵厚秩亦已報之，平生祝髮披緇霑榮俎豆，其為瀆禮，誠如聖見，請移祀大隆興寺，大常春秋祀，制曰可。」²⁵

史源尋找結果，《明史》作者寫〈姚廣孝傳〉，主要史料是《名山藏》的〈姚廣孝傳〉，並配合《國朝獻徵錄》及《實錄本傳》校之，《名山藏》及《皇明泳化類編》等，都是修《明史》者常用之書，如徐乾學〈脩史條議〉：

前人之成書其久行於世者，如吾學編……名山藏，泳化類編等書，但可用以參觀，未可據為篤論，蓋昔人著作名書美而不書惡，今茲之筆削，既有褒而更有譏體……²⁶。

其中以爲《名山藏》及《泳化類編》是可參用，只是必須佐證其他史料，而《明史》以《國朝獻徵錄》和《實錄本傳》參校《名山藏》，亦是合理之舉，因爲〈脩史條議〉又云：「史材之最博者，無如獻徵錄……」²⁷，由此可知，焦竑（1541-1620年）《國朝獻徵錄》甚爲修《明史》者所重，便可見一斑。

²⁵ 何喬遠：《名山藏》，收入於周駿富《明代傳記叢刊》，第七十三輯，台北：明文，1991，pp：349-355。

²⁶ 徐乾學：《憺園文集·（二）》，pp：718-719。

²⁷ 同註 13。

參、《明史、姚廣孝傳》的校讀

修撰《明史》之博學鴻詞科學者，其在撰寫明人傳記時，皆是增損明代野史傳記而成，雖經過萬斯同審閱裁定，後又有王鴻緒和張廷玉整理而成，然其成傳所用史料實皆有問題，故〈潘次耕修明史議〉：

實錄即多舛錯，錢氏辨證略見一斑，家乘爵里年月可憑而多虛美，野史紀事、言人、人殊……必也分割排纂……竊其虛實，參伍眾說歸於一²⁸。

另在〈徐乾學脩史條議〉：

家乘野史未可盡信，必本之實錄而參以他書……願加博訪之力，無據一家之言²⁹。

在修史所用材料未可盡信，必加博採，加上清廷統治有其禁忌，故傳中偏激，錯誤可議之部分頗多，以下便列《明史、姚廣孝傳》中幾點可討論處，分述如下：

一、姚廣孝，長洲人，本醫家子，年十四，度為僧，名道衍，字斯道。

姚廣孝出家時間，明代野史有兩種不同記載，一為十四歲；二為十八歲。《守溪筆記》：「至正間，年十四，遂出家於里之妙智庵，名道衍」³⁰，《皇明泳化類編》：「至正壬辰，年十四，出為僧，居妙智庵，法名衍，字斯道」³¹，《名山藏》：「年十四，白父曰不願醫，願仕……因削髮為僧，名道衍，字斯道」³²，及《明史》和《明史稿》：「年十四，度為僧，名道衍，字斯道」³³，此皆認為廣孝乃是年十四剃度為僧，又在另一些野史中，則記載廣孝剃度為僧是在十八歲，如《留青日札》：「壬辰年遂出家，入里之妙智庵，改名道衍」³⁴和《雙槐歲鈔》：「壬辰披剃為僧，名道衍」³⁵，其中壬辰為元順帝十二年，西元1352年，廣孝年十八歲，非十四歲。另外在《明書》：「至正壬辰，年十

²⁸ 潘次耕：〈潘次耕修明史議〉，劉承幹《明史例案》，收入於楊家駱《明史》，台北：文鼎，pp:76-78。

²⁹ 徐乾學：《憺園文集·(二)》，pp:718-719。

³⁰ 王鏊：〈姚廣孝〉，《守溪筆記》，收入於沈節甫：《紀錄彙編》，明萬曆四十五年陽羨陳于廷刊本，卷一百二十四，pp:3-5。

³¹ 鄧球：〈姚廣孝〉，鄧球《皇明泳化類編》，卷四十七，台北：國風，1971，pp:612-617。

³² 何喬遠：〈姚廣孝〉，何喬遠《名山藏》，卷七，台北：成文，1971，pp:5-12。

³³ 張廷玉：〈姚廣孝〉，楊家駱《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台北：鼎文，1975，pp:4079-4082。

³⁴ 田藝蘅：〈姚廣孝〉，田藝蘅《留青日札》，明隆慶王申錢唐田氏刊本，卷二十七，pp:13-14。

³⁵ 黃瑜：〈姚少師〉，黃瑜：《雙槐歲鈔》，明嘉靖戊申黃氏家刊本，卷三，pp:10-12。

四出為僧，居妙智庵」³⁶，《明書》記載時間和年齡皆不符，顯然是錯誤，至於是十四歲或十八歲為廣孝出家時間，在《姚少師祠堂記》碑文記載：「至正間，年十四，即從佛，父不奪吾志，遂出家相城之妙智庵，禮宗傳為師，訓名道衍，十八歲剃髮為僧，游寄海上」³⁷，而在元明兩代佛教戒律以《四分律》為主，《四分律》記載：「十八童女二歲學戒，二十得受具足戒，白四羯磨……」，「世尊告阿難，不應授年未滿二十者具足戒，何以故，年未滿二十，不堪忍寒熱飢渴……」³⁸，故比較《碑文》和《四分律》，廣孝年十八出家剃度乃較合理，所以《明史》記十四度為僧，實是錯誤。

二、其至長洲，候同產姊，姊不納，訪其友王賓，賓亦不見，但遙語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復往見姊，姊詈之，廣孝惘然。

據《名山藏》等明代野史記載，上段引文發生時間，應是要接在廣孝出賑蘇、湖，至長洲，以所賜金帛散宗族鄉人之後，廣孝回鄉賑災，事成後並往見王賓及其姊。《明史》刻意將其分開，因為如將之擺在一起，則前後出現矛盾，即散財鄉人，何以其友及姊卻詈之？當中必有問題，考證如下：

據《明史考證擷逸》：

（廣孝）訪其友王賓，賓亦不見，按明人雜記載，廣孝至長洲，徒步往訪王賓、歡若平生，賓為作賑災記，以鋪陳功德……³⁹。

《王橫雲史例議下》：

實錄永樂二年六月乙未，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等往蘇湖賑濟，震澤記聞云，吳有王光菴先生，賓者高士也，與廣孝友，舊詣之閉門不納，再往復不納，三往乃見之，曰渠曷為作此事……見廣孝連呼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列朝詩集王高士序云，賓字仲光，長洲人，同里好韓奕先生及姚榮國道衍，榮國定策後徒步往訪，歡若平生，作賑災記鋪陳其功德，沒而榮國為立傳，兩公契分如此，世盛傳仲光詆其榮國，方盥卻走，終不見，吳兒委巷妄語流誤，史家不可以不正也，牧齋先生廣見博聞所引賑災記及榮國作王賓傳必曾見之，其言確矣，大約常時吳下文人多不滿靖難事故，借筆墨以詆佐命之臣，或鋪張用刑之，慘以彰成祖之虐……鄭端簡名臣記云，公至正間，削法為僧於里中妙智庵，

³⁶ 傅維麟：〈姚廣孝〉，傅維麟《明書》，卷一百二十五，台北：新文豐，1985，pp:6-11。

³⁷ 姚繼：〈姚少師祠堂記〉，陳惟祗：《相城小志》，卷二，台北：成文，1983，pp:103-113。

³⁸ 《四分律》卷二十七卷十七，《大正藏》，第二十二冊，台北：新文豐，p.755c，p.679c。

³⁹ 王頌蔚：《明史考證擷逸》，台北：學生，1968，p.94。

嘗遇異人，授占術，好讀兵書，兼為詩書……公居吳為高啟北郭十友之一……⁴⁰。

由上兩段引文可知，王賓等廣孝家鄉舊友，不因靖難而鄙之，兩人互相交好，王賓即世，廣孝尚為之作傳，廣孝死後，里中人為尊敬之，於妙智庵後設祠祭祀之，祠堂亦由其孫立碑，碑文也流露對其思念之情。

三、十六年三月入覲，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慶壽寺……尋卒，帝震悼，輟視朝二日，命有司治喪，以僧禮葬。

《明史》記載姚廣孝死於永樂十六年，但歷來對姚廣孝的卒年有永樂六年和永樂十六年之爭論。明代野史中，記載姚廣孝死於永樂六年有：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永樂六年，來朝北京，仍居慶壽寺，病篤，車駕臨視，問後事，對曰：『出家人復何所戀？』明日，昭諸門人，告以去期，斂袂端坐而逝。」⁴¹，尹守衡《明史竊》：「六年，入覲北京時，八十有四矣，其年三月，自知其將逝也，先以其期昭諸門人，上臨問後事，對曰：『出家人復何所戀？』卒。」⁴²，及焦竑《國朝獻徵錄》和李贄《續藏書》所收〈神道碑（姚廣孝）〉：「永樂之六年三月，來朝北京，仍居慶壽寺，朕（成祖）往視之，與語極懽，至二十八日召諸門人，告以去期，即斂袂端坐而逝，享年八十有四，朕聞之，哀悼不勝」⁴³。由上列之筆記小說可知，的確是有記錄姚廣孝死期為永樂六年的資料。

然而，據本章第一部分所考證，壬辰年，廣孝十八歲，時為元順帝至正十二年，西元 1352 年，往前推算廣孝生辰是 1335 年，而其活了八十四歲，故廣孝生平為西元 1335 年至 1418 年，西元 1418 年為戊戌年，即為永樂十六年。又根據最原始，年代最正確之《實錄本傳》記載：「永樂十六年……戊寅太子少師姚廣孝卒，廣孝蘇之長州人……」⁴⁴可知，廣孝卒年應是永樂十六年，《明史、姚廣孝傳》此段記載是有經過考證，明代有些野史大概誤把「永樂十六年」寫成「永樂之六年」，後人作傳不察，遂有人主張廣孝逝世於永樂六年。

⁴⁰ 王鴻緒：〈王橫雲史例議下〉，劉承幹《明史例案》，收入於楊家駱《明史》，台北：鼎文，1975，p.42。

⁴¹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下）閩集》，台北：世界，1961，p.669。

⁴² 尹守衡：《明史竊》，收入於周駿富《明代傳記叢刊》，第八十二輯，台北：新文豐，1986，p.440。

⁴³ 明成祖：〈姚廣孝神道碑〉，焦竑《國朝獻徵錄》，明萬曆丙辰，錢塘徐象禱刊本，卷六，pp：512-516。李贄：《續藏書》，收入於周駿富《明代傳記叢刊》，第一百〇六輯，台北：新文豐，1986，p.170。

肆、撰寫《明史、姚廣孝傳》的立場

《明史》歷六十年而成書，先由明遺民萬斯同，本其師黃宗羲之教，以布衣主史局，與史官名家數十人，分散編年體之《明實錄》，參以邸報及他書文，以成紀、表、志、傳之萬氏《明史稿》，後王鴻緒又攘之以成王氏《明史稿》，復由張廷玉等改定為《明史》，乾隆四年表上，即是現在《武英殿本明史》⁴⁵，既然現行《明史》乃據王氏及萬氏之《明史稿》而來，隨政治，社會環境不同，其內容當有所損益，所以在此先比較三本書中〈姚廣孝傳〉之異同，以便正確找出其作傳立場和考量，其中萬氏《明史稿》難見，今以據上文考據可以用徐乾學《明史列傳》代之，三傳相異者有三分列於下：

一、《明史列傳》：「出賑蘇湖，至長洲候同產姊，姊不納，詈之不與見，訪其友王賓，賓亦不見，但遙語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復往見姊，姊詈之，廣孝惘然，退以賜金帛散宗族鄉人」⁴⁶。

《明史稿》：「出賑蘇湖至長洲，以賜金帛散宗族鄉人，少時與王賓，高啟輩善為北郭十友之一，至是賓猶存，徒步往訪，歡若平生，賓為作賑災記，以鋪陳其功」⁴⁷。

《明史》：「出賑蘇湖，至長洲，以所賜金帛散宗族鄉人。……其至長洲，候同產姊，姊不納。訪其友王賓，賓亦不見，但遙語曰：『和尚誤矣，和誤矣。』復往見姊，姊詈之，廣孝惘然」⁴⁸。（廣孝往見其姊及王賓，《明史》補之於傳後，按時間先後，其應緊接於出賑蘇湖之後。）

由三段引文比較，《明史稿》認為王賓及廣孝姊姊不以廣孝佐成祖得位是錯誤。《明史列傳》及《明史》則以為廣孝佐成祖，發起靖難為非，其中《明史》顯然是先抄襲《明史稿》，後再加入王賓（號光庵，長洲人）及廣孝姊詈廣孝之內容於傳後。

二、《明史列傳》：「僧溥洽繁久，願赦之，帝即坐命出焉，溥洽者，建文帝主錄僧也，或言建文帝遜位時，召溥洽削髮，由水關出亡，或言匿溥洽所，帝以他事禁溥洽，命給事中胡濙太監鄭和，遍物色建文帝，不可得，而溥

⁴⁴ 〈實錄姚廣孝本傳〉，《明太宗實錄》，卷一百九十八，台北：中研院，1981，p.4。

⁴⁵ 楊家駱：〈明史識語〉，收入於楊家駱《明史》，p.1。

⁴⁶ 徐乾學：〈姚廣孝〉，徐乾學《明史列傳》，卷二十一，台北：學生，1967，pp：3-9。

⁴⁷ 王鴻緒：〈姚廣孝〉，王鴻緒《明史稿》，列傳二十九，台北：明文，1991，pp:1-40。

⁴⁸ 張廷玉：〈姚廣孝〉，楊家駱《明史》，卷一百四十五，pp:4079-4082。

洽繫十年餘，至是得釋，廣孝頓首謝」⁴⁹。

《明史稿》：「廣孝曰溥洽繫久，願赦之，帝即坐命出焉，溥洽者建文帝主錄僧也，廣孝頓首」⁵⁰。

《明史》：「廣孝曰，僧溥洽繫久，願赦之。溥洽者，建文主錄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為僧遁去，溥洽知狀，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給事中胡濙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不可得，溥洽坐繫十餘年，至是，帝以廣孝言，即命出之，廣孝頓首謝」⁵¹。

《明史稿》於此部分，其解釋語焉不詳，不如《明史列傳》和《明史》對於溥洽為何被繫，敘述甚明，《明史稿》當有意替廣孝規避靖難之事實。

三、《明史列傳》：「姚廣孝佐命嗣興，勞烈具有，顧桑門上首班諸功臣，恐不足尊祖敬宗……」⁵²。

《明史稿》：「姚廣孝佐命嗣興，勞烈具有，顧係釋氏之徒，班諸功臣並食於大祖側，恐不足尊敬祖宗……」⁵³。

《明史》：「姚廣孝佐命嗣興，勞烈具有，顧係釋氏之徒，班諸功臣，侑食太廟，恐不足尊敬祖宗……」⁵⁴。

此部分乃文詞損益，無有特別顯明之立場。

由以上三部分比較，可推論出以下幾點假設：

- (一)《明史稿》給廣孝正面評價，有意替其迴避靖難之過。
- (二)《明史列傳》反映出徐乾學及萬斯同，對姚廣孝好壞事並舉的立場，於靖難之變，他們採取負面評價。
- (三)《明史》似乎是綜合王氏和萬氏之《明史稿》而來，只是秉諸事皆羅列立場作傳。

對於推論出之三個假設，下文則引諸史料辨證之。

⁴⁹ 同註 31。

⁵⁰ 同註 32。

⁵¹ 同註 33。

⁵² 同註 31。

⁵³ 同註 32。

⁵⁴ 同註 33。

重視，《明史稿》中的姚廣孝受人讚譽亦是預料中之事。所以《明史稿》所表現出來的立場和萬斯同及徐乾學修史主張，可謂兩之極端。

及雍正朝，張廷玉奉詔為史館總裁，其就王鴻緒原本，選史臣再加訂正，如楊農先〈上明鑑綱目館總裁書〉：

雍正元年秋，特命重修，舊時草卷不可復得，館中所有，惟累朝實錄，及名人傳記，而傳記亦十不存一、二，名為重修，閣下所委者，僅於紀傳後綴以贊辭，及以意更目次，或點竄字句，未能將現存之書，與王公史稿細加討論……⁶¹。

又〈上明史表〉云：

聚官私之紀載，核新舊之見聞，籤帙雖多，抵牾互見。惟舊臣王鴻緒之史稿，經名人三十載之用心，進在形闡……首尾略具，事實頗詳……爰即成篇，用為初稿⁶²。

張廷玉既然以王本《明史稿》為初稿，其修成《明史》必因襲王氏之立場，但張廷玉在修《明史》各傳時，其把他對人物褒貶及欲增損部分，置於初稿傳後，加入此似贊辭的部分，其立場就不一定是和王本《明史稿》相同，《明史·姚廣孝傳》把王賓和姚廣孝姊對廣孝詈罵部分加入，展現的立場則和徐乾學《明史列傳》相同，講述忠孝，維護統治者正統地位，認為廣孝佐成祖之舉為錯誤。

以上乃是從外部環境如政治，時間變化……等因素，來檢討《明史·姚廣孝傳》之立場，但據第一部分的分析，《明史·姚廣孝傳》大部分都改寫《名山藏》而來，故在檢視《明史·姚廣孝傳》的立場時，必須再配合《名山藏·姚廣孝傳》的立場，加以進行分析。

《名山藏》乃是明代人寫明代史，何喬遠（萬曆十四年進士）寫《名山藏》之動機，據錢謙益序云：「……萬曆中銜德洽聞，蔚為大儒，慨國史之無成書也，易推典謨，勾稽掌故，發憤盡氣，編摩數十年，遂告成」⁶³，由此可知，喬遠成《名山藏》乃是慨國史之無成書，用以彌補官書之不足；另一方面，《名山藏》可產生條件，則是萬曆十六年欲改小實錄式樣，改寫之際，使實錄流出民間，何喬遠亦在此時為官，因此得閱讀實錄，遂助《名山藏》產

⁶¹ 楊農先：〈上明鑑綱目館總裁書〉，pp: 80-84。

⁶² 張廷玉：〈上明史表〉，《明史》，台北：國防部，1974，pp:2-9。

⁶³ 何喬遠：《名山藏》，pp:1-6。

明史主要修成於康熙和雍正時期，故康熙及雍正的修史態度必會影響到明史的修撰，康熙帝的修史態度，由《明史例案》中收錄的詔諭便可推知，其記載：「……明史不可不成公論，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繫……」⁵⁵，「諭大學士等，爾等所進明史，朕已詳閱……凡編纂史書務宜考覈精詳，不可疏露。」⁵⁶，「獨修史宜直書實事，豈可空言文飾……明史修成之日，應將實錄並存，令後世有所據……」⁵⁷，所以聖祖認為修史必須有公論，欲得公論則必須考據精詳，對史料態度則必羅列並存，以便後人對照查，在聖祖修史主張下，萬斯同及徐乾學的修史態度，較符合聖祖之意。

如《儵園文集、送萬季野南還》：

霜花醪酒送君還，邸舍相依十載間，慣對卷編常病眼，與談忠孝即開顏，折衷三禮宗王鄭，泚筆千秋續馬班，蒲葦獨驅驚歲暮，凍雲寒雪滿江關⁵⁸。

又《儵園文集、班馬異同辨》：「臣聞史之為書，體閱而義密，事核而辭達，采之博而擇之精……」⁵⁹，故知徐乾學主張亦如聖祖，望修史必博採，比較擇其精，擇其精者，正如取之公論，而助乾學修《明史》之萬斯同，則好談忠孝之事，如此於《明史》中，廣孝好壞之事並列，佐靖難奪國之事，獲得負面評價，當不難理解。

同樣在康熙朝修《明史》之王鴻緒，其改訂萬斯同手稿後的《明史稿》，在立場上卻不符合聖祖之主張，原因據《嘯亭續錄》言：

惠宗遜國，事本在疑似之間，今王本力斷為無，凡涉遜國之事，皆為刪削……永樂以藩臣奪國，今古大變，王本於燕多恕辭，是以成敗論人，殊非直筆……。

王尚書左袒廉王以謀奪嫡，讀《明史稿》於永樂篡逆及姚廣孝、茹瑺諸傳每多恕辭，而於惠帝則指摘無完膚，蓋其心有所陰蓄，不覺流露於書，故古人不使奸人著史，以此王司徒之言，史可厚非也⁶⁰。

正因王鴻緒欲袒廉王奪位，故對於忠、孝、節、義之事，《明史稿》皆不

⁵⁵ 清聖祖：〈聖祖仁皇帝諭〉，劉承幹《明史例案》，收入於楊家駱《明史》，pp:5-8。

⁵⁶ 同註40。

⁵⁷ 同註40。

⁵⁸ 徐乾學：《儵園文集、(二)》，pp:718-719。

⁵⁹ 徐乾學：〈班馬異同辨〉，《儵園文集(二)》，卷十五，p.741。

⁶⁰ 汲修主人：〈明史稿〉，汲修主人《嘯亭續錄》，卷二，台北：廣文，1987，pp:7-8。

生⁶⁴。

然欲檢視《名山藏》的立場，從其章節目次安排即可反映出，喬遠基本上是位正直不阿之士，其撰《名山藏》特別強調君子、小人各有類，故把君子列入〈臣林記〉、〈宦者記〉。而小人則入〈臣林雜記〉、〈宦者雜記〉，〈臣林記〉記載名臣事蹟，〈宦者記〉專錄賢官；而〈臣林雜記〉專述權臣，〈宦者雜記〉則載權宦，另外把讀書懷孤獨之行，而身孝悌君子事跡入〈本土記〉⁶⁵。

總括上述，《名山藏》之寫作立場，著重於君子、小人之辨，希望大家成君子而整頓社會秩序，在此立場下，姚廣孝當是其極力攻擊者，於傳中充分表現廣孝於靖難之不忠，對廣孝散金帛於鄉人之事，則是略而不書，於喬遠眼中，廣孝非君子即可見之。

故以《名山藏》之立場配合修《明史》之外部環境，如政治、時間變化……等，可歸納出，《明史、姚廣孝傳》所採取立場和表現出之意識如下：

- (一)特重忠、孝…等節義，強調自己成為君子是重要，以君子之德行改善社會風俗。
- (二)強調忠君，正統重要性，不許賊臣亂子篡位。

以上乃是《明史、姚廣孝傳》表現出的意識，大體而言，其著重的行為，皆是為鞏固君主統治，隨現代民主制度的發展，以此鞏固君主統治的德性為切入點，去形塑〈姚廣孝傳〉當不合時宜，在此並非覺得忠孝不重要，但亦不主張後現代主義之權力便是知識，去迎合權力者脾胃，只是欲找出另一切入點形塑傳記，使傳記更具現代感，更具現代關懷，在想把關懷點擴大之要求下，則必須考慮以更合時代的立場來作傳。

《明史、姚廣孝傳》只討論到姚廣孝之政治功過，廣孝是位僧人，對當時佛教貢獻之巨大，傳中則無述及。明代太祖、成祖以儒家思想立國，佛教只是處於輔助地位，政府設官統治僧人，並限制出家的資格，佛教在儒教壓抑下，已不為人所重，廣孝著〈佛法不可滅論〉，力陳對佛教壓抑是徒勞無功。除了應付當局對佛教之壓迫，在明代猶存有自二程（程頤、程顥）及朱子（朱熹）排佛浪潮，針對此，廣孝著《道餘錄》聲明佛教對社會貢獻。

廣孝於疏通佛教及政治關係外，於教理上亦有貢獻，明代佛教思想走上

⁶⁴ 高春緝：〈何喬遠《名山藏》初探〉，《黃埔學報》，第三十一輯，1996，pp:101-103。

⁶⁵ 高春緝：〈何喬遠《名山藏》初探〉，p.108。

以禪淨爲主軸，並融合各宗之勢，廣孝著之《諸上善人詠》及《淨土簡要錄》則開以淨濟禪的先河。

以下便簡介《道餘錄》、〈佛法不可滅論〉、《淨土簡要錄》和《諸上善人詠》之內容，藉以明白姚廣孝對佛學及佛教之真正貢獻。

姚廣孝早年師事徑山智及禪師，智及禪師爲元末明初著名的僧侶，與爲政者關係良好，姚廣孝拜其爲師，除了學習禪法、熟悉佛教界外，也因透過智及禪師之關係，因此認識許多名士，如宋濂(1310-1374年)、高啓(1336-1374年)、蘇伯衡(明太祖時之翰林編修)等⁶⁶，故姚廣孝在熟悉政界及佛教界之背景下，又因本身爲僧侶及反對政治力量壓迫佛教，遂有《道餘錄》及〈佛法不可滅論〉等護教書之傳世。

《道餘錄》⁶⁷主要是針對二程和朱子之排佛傳統進行反駁，二程和朱子認爲(一)佛教違反倫常，是爲絕倫類，且自私自利，獨善其身不兼善天下，教徒皆懶胡，首重解脫生死，證明其是怕死；(二)耽於禪樂，認爲禪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視之爲理障，並對禪宗的心性提出「別尋一個好底性來換此個不好底性」之批評；(三)佛教經典如《維摩詰經》和《楞嚴經》等，皆後人僞造，且言佛教爲夷狄之教。姚廣孝亦朝上述三方面進行反駁，認爲(一)引《華嚴經》說明佛法即世間法，絕非自私獨善且枯槁山林而已，佛教徒度眾生，拔苦得樂，乃是兼善天下，去一己之小愛而完成全體人類大愛，並引《易經》：「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證明知死乃重要；(二)反駁禪學無用，認爲禪乃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不舍一法，有止即有用，而且覺得自性是如如不動，是不會被污染。有生滅是因人們一念之妄起；(三)認爲《維摩詰經》自成一家之言，其中無老莊之語，於中國出現三種版本，絕不是蕭子良之徒所撰。言《楞嚴經》之咒語乃燒牛糞而出，是無根據，另外又強調佛法化人爲善與儒道相同⁶⁸。

以上乃是《道餘錄》的內容，其主要是反駁歷史上排佛的傳統，但針對明太祖和明成祖以儒家爲主體，而用佛道爲之助的宗教政策，則提出〈佛法不可滅論〉加以護教疏通⁶⁹，認爲把佛教當做統治工具，如違反政治則抑制是徒勞無功，所以〈佛法不可滅論〉便言：

⁶⁶ 江燦騰：〈道衍禪師的生平與佛教思想〉，pp：82-87。喬傳：〈明初著名的政治家姚廣孝〉，pp：120-122。

⁶⁷ 姚廣孝：《道餘錄》，荒木見悟《和刻影印近世漢籍叢刊》，思想四篇，第五冊，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pp：3967-4234。

⁶⁸ 江燦騰：〈道衍禪師的生平與佛教思想〉，pp：87-100。許淑惠：〈梵琦、道衍的佛教思想及其著作研究〉，pp：92-116。

⁶⁹ 姚廣孝：〈佛法不可滅論〉，周永年《吳都法乘》，收入於藍吉富主編《大藏經補篇》，第三

隨滅隨興，況興之愈盛也，縱有其勢力而能滅，但滅其所主之地眾，能滅其普天率土者哉⁷⁰。

由此引文便知，廣孝不贊成滅佛，佛教愈受壓抑愈是會蓬勃發展，當局應順世局而興佛⁷¹。

除了《道餘錄》和〈佛法不可滅論〉外，姚廣孝另有《淨土簡要錄》和《諸上善人詠》之著作，此爲其洪武十四年的作品，當時廣孝未政治上獲得高位，一心尋求往生西方，爲堅定自己信心，遂有此些作品⁷²。《淨土簡要錄》⁷³乃廣孝爲鄉野人士所編輯之淨土典籍，故於序中言：

今夫窮鄉絕島，吾友良導之，不過言一字已不違，縱有學者，無師可問，無書可證，其驚於邪僻繆妄之塗者，蓋幾希矣……圖妙明著者，成皆采擷……名之曰《淨土簡要錄》⁷⁴。

《淨土簡要錄》之內容則有《虛山集》、《十疑錄》、《阿彌陀經通贊》和《龍野淨土文》……等諸書之選抄，此皆力倡念佛、往生西方淨土、念佛比供養佛羅漢更有功德者，故整個《淨土簡要錄》的思想實可用「念佛不礙參禪，參禪不礙念佛，法雖二門，理同一致」來說明，而此書亦開明代禪淨合一之先鋒⁷⁵。

《諸上善人詠》和《淨土簡要錄》是同一時期的作品，根據本書的序文所論及的動機，《淨土簡要錄》是爲別人設想，抄錄淨土要典之作，《諸上善人詠》是爲增強自己往生西方而寫作，所以廣孝於序中言：

衍不敏，早入教彀中，棄而歸禪苑，雖俱染指，皆無所就。然暮景漸迫，志在淨邦，故於禮誦之餘，綴取歷代傳記，並近期所聞見往生者，無問聖、凡、淄、白得一百二十二人，各賦詩以美之，共一百二十二者，編次成帙……儻能藉此起信，而興念庶，吾願遂矣，使他日爲淨土游，與諸上善人遨嬉于花池寶林之間，聽法音而蒙聖記，如此則道化之一異，

十四冊，台北：華宇，1986，pp：521-522。

⁷⁰ 同註 54。

⁷¹ 同註 4。

⁷² 江燦騰：〈道衍禪師的生平與佛教思想〉，pp：84-85。

⁷³ 姚廣孝：《淨土簡要錄》，《叢刊》，第108冊，台北：新文豐，1985，pp：199-220。

⁷⁴ 姚廣孝：《淨土簡要錄》，p199a。

⁷⁵ 江燦騰：〈道衍禪師的生平與佛教思想〉，pp：100-103。許淑惠：〈梵琦、道衍的佛教思想及其著作研究〉，pp：120-124。

夫復何論⁷⁶。

所以《諸上善人詠》乃是以歌詠為主，輔以各善人生平資料簡介，共一百二十二首詩，歌詠往生淨土者，有菩薩、比丘、比丘尼和優婆塞及優婆夷，首為文殊菩薩，終於陶氏十六娘，人物選取，基本上也按時間先後順序排列⁷⁷。

由上可知，姚廣孝在佛學研究和護教上，存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故學者在研究他的時候，實在有必要把其此方面的成就，配合他的生平來加以深入的瞭解，以平衡《明史、姚廣孝傳》中，只專述姚廣孝政治作為之缺憾。

另外《明史、姚廣孝傳》雖然只論述姚廣孝在政治上的功過，但是傳中所呈現的是一個貪圖權貴、不忠不孝、諛謗先賢的僧侶，如此負面的評價實有欠公平。於明代所留存的筆記小說和碑刻中，則又存在一個不貪圖權位、不重名利、安然處世、儼然為一名它方高士之姚廣孝，如《釋氏稽古略續集》：「始復姓姚，賜名廣孝，上自是稱為姚少師而不名，亦終不蓄髮娶妻，居止多在僧寺，嘗賜二宮人，亦不近，上乃昭還」⁷⁸，《神道碑》：「嘗歸吳中，以所賜金帛悉散之宗族鄉人，其平生樂善好施，天性然也」⁷⁹，《姚少師祠堂記》：「六月奉命往蘇松二府賑濟，賜玉帶一條，鈔一千錠，還里廣孝以上所賜鈔帛分遺親族」⁸⁰，上述反映廣孝不貪富貴、不接受宮第及金帛，居寺淄衣過其一生，又《皇明世說新語》記載：

姚少師歸吳，每曳履獨步，偶遇一丞喝道來，少師行如故，丞怒執而市笞，不為理有，識者曰此少師也。丞大驚伏地，少師徐云，且送郡獄，明日出之。謂太守曰，此輩不識事，一野僧行道，何足怒而笞之，吾昨乃相戲耳，更不罪丞⁸¹。

由此段引文可知，廣孝亦不貪圖權勢，不以權勢壓人，總之，在此些資料中，姚廣孝基本上是一個不貪圖富貴及權力的僧侶，故其有詩云：

憶昔絕江適荊楚，高浪觸船難者艣。
黑雲黯黯北風顛，篙師魄喪惟呼天。
世人知險是風波，那識人心險更多。

⁷⁶ 姚廣孝：《諸上善人詠》，荒木見悟《和刻影印近世漢籍叢刊》，思想四篇，第五冊，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pp：4033-4234。

⁷⁷ 同註4。

⁷⁸ 幻輪：《釋氏稽古略續集》，《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九冊，台北：新文豐，1983，p.941a。

⁷⁹ 明成祖：〈姚廣孝神道碑〉，焦竑《國朝獻徵錄》，明萬曆丙辰錢塘徐象檉刊本，卷六，pp：512-516。

⁸⁰ 陳惟祗：《相城小志》，台北：成文，1930，p14。

人心對面九疑山，一笑殺人俄頃間。
貧賤安居良不惡，名利奔馳有何樂。
此日披圖心為驚，老年無事不江行⁸²。

廣孝於此〈題江行風浪圖〉詩中，藉長江風疾浪高，船行艱險來寫人心世道，江濤雖起伏可畏，但人心難測，其虛妄所造成的猜忌，比起江浪更為凶險，廣孝有如此認知，便不會為名利權勢所役使，故其屢次稱自己為高陽酒徒或老病之貓，晚年更說服明成祖放了暗助惠帝逃脫之溥洽（1346-1426年）⁸³，由上敘述可知，《明史、姚廣孝傳》其實是有偏頗，從另一角度而言，姚廣孝卻是一位有佛學修為，又不失僧侶本色的高僧，故在閱讀《明史、姚廣孝傳》和有關傳記與探討他的生平時，有必要再對其做一番省思和重新認識，姚廣孝在政治上和教界皆活躍，《明史、姚廣孝傳》只敘述其政治上的功績。所以本文建議採取：以其佛教活動平衡其政治活動的觀點為傳。

伍、結論

姚廣孝本醫家子，世代貧寒，但他有偉大的抱負，加上孜孜不倦的學習，終因曾佐明成祖靖難有功，官拜僧錄司左善世、資善大夫及太子少師，於政治上，權傾一時，名動京師，而在佛學研究上，姚廣孝著有《道餘錄》、〈佛法不可滅論〉、《淨土簡要錄》和《諸上善人詠》等書。其中《道餘錄》及〈佛法不可滅論〉論及儒釋道三家，為當時佛教之護教書，並且是研究明代儒釋關係不可或缺的材料；而《淨土簡要錄》和《諸上善人詠》是談論念佛、求生西方等淨土有關之思想，這些著作更是開後世禪淨合一的先河。故姚廣孝實為明初之重要僧侶，對當時佛教界有其深遠的影響，但因其佐靖難之役、《道餘錄》諛謗先儒（二程及朱熹）為非、與佛學較相近之陽明學不被朱學者所接受、及統治者以儒家思想為立國基礎，終為士大夫們所輕。本文所分析之《明史、姚廣孝傳》，也指姚廣孝為貪圖權力富貴、不忠不義之人，如此盡書其負面的評價，不僅有違歷史的真實性，（留存史料中，亦有描述廣孝為一個不貪富貴權勢之高僧）就是對姚廣孝而言，亦甚為不公，況且其在政治上，有其成就外，在佛學研究上，他的《淨土簡要錄》更是開創明代禪淨合流之先鋒，故後人在評價姚廣孝時，當應再深思之，於此建議：以姚廣孝對佛教及佛學的貢獻來平衡其政治活動的觀點為傳。

⁸¹ 李紹文：〈姚少師〉，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明萬曆庚戌雲間李氏刊本，卷三，p.1。

⁸² 轉引自許淑惠：〈梵琦、道衍的佛教思想及其著作研究〉，p.80。

⁸³ 喬傳：〈明初著名的政治家姚廣孝〉，pp：124-128。

參考書目

專書

- 王 鏊：《守溪筆記》，收入於沈節甫《紀錄彙編》，明萬曆四十五年陳于廷刊本。
王 鏊：《震澤紀聞》，明永熙刊本。
王兆雲：《皇明詞林人物考》，明萬曆間刊本。
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北京：中華，1985。
王世貞：《明卿續紀》，收入於沈節甫《紀錄彙編》，明萬曆四十五年陳于廷刊本。
王世貞：《明詩評敘》，收入於沈節甫《紀錄彙編》，明萬曆四十五年陳于廷刊本。
王頌蔚：《明史考證攝逸》，台北：學生，1968。
王鴻緒：《明史稿》，台北：明文，1991。
毛佩琦：《明成祖史論》，台北：文津，1994。
幻 輪：《釋氏稽古略續集》，收入於《卍續藏經》，第一百二十四冊，台北：新文豐，1986。
文 琇：《增集續傳燈錄》，收入於《卍續藏經》，第一百四十二冊，台北：新文豐，1986。
尹守衡：《明史竊列傳》，收入於周駿富《明代傳記叢刊》，第八十二—八十四輯，台北：明文，1991。
中華佛教文化會館：《大正藏》，台北：中華佛教文化會館，1959。
中華佛教會：《卍續藏經》，台北：中國佛教會，1967。
中央研究院：《明太宗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1981。
田藝衡：《留青日札》，明隆慶壬申錢塘錢氏刊本。
朱太韶：《皇明名臣墓銘》，明蘭格鈔本。
朱當澍：《靖難功臣錄》，收入於周駿富《明代傳記叢刊》，第六十輯，台北：明文，1991。
朱竹垞：《靜志居詩話》，收入於周駿富《明代傳記叢刊》，第八輯，台北：明文，1991。
李 詡：《戒庵老人漫筆》，明萬曆丁酉江陰李氏刊本。
李 贄：《續藏書》，台北：學生，1986。
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明萬曆庚戌雲間李氏刊本。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台北：偉文，1976。
何喬遠：《名山藏》，台北：成文，1971。
郎 瑛：《七修類稿》，明嘉靖閩中原刊本。
查繼佐：《罪惟錄、乘時諸臣》，收入於周駿富《明代傳記叢刊》，第八十六輯，台北：明文，1991。

- 姚廣孝：《逃虛子詩集》，清黃丕烈手跋抄本。
姚廣孝：《諸上善人詠》，荒木見悟《和刻影印近世漢籍叢刊》，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
姚廣孝：《道餘錄》，荒木見悟《和刻影印近世漢籍叢刊》，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
姚廣孝：《淨土簡要錄》，收入於《卍續藏》，第一百〇八冊，台北：新文豐，1985。
唐 樞：《國琛集》，明嘉靖原刊本。
徐乾學：《儋園文集》，台北：漢華，1971。
徐乾學：《明史列傳》，台北：學生，1967。
荒木見悟：《和刻漢籍資料叢刊》，東京：中文，1984。
陳仁錫：《皇明世法錄》，明末原刊本。
陳惟圻：《相城小志》，台北：成文，1930。
陳 田：《明詩紀事》，收入於周駿富《明代傳記叢刊》，第一十三輯，台北：明文，1991。
陳守實：《明史考證抉微》，台北：學生，1968。
黃 瑜：《雙槐歲鈔》，明嘉靖戊申黃氏刊本。
莊廷鑑：《明史鈔略》，收入於周駿富《明代傳記叢刊》，第一百〇七輯，台北：明文，1991。
焦 竑：《國朝獻徵錄》，明萬曆丙辰錢塘徐象檣刊本。
傅維麟：《明書》，台北：新文豐，1985。
過庭訓：《明分省人物考》，明天啓間原刊本。
張 萱：《西園聞見錄》，收入於周駿富《明代傳記叢刊》，第一百一十七輯，台北：明文，1991。
張廷玉：《明史》，台北：鼎文，1975。
鄭 曉：《吾學編》，明隆慶元年海鹽刊本。
潘德深：《中國史學史》，台北：五南，1994。
談 遷：《國權》，台北：鼎文，1971。
鄧汝璧：《皇明功臣爵考》，明萬曆原刊本。
鄧 球：《皇明泳化類編》，台北：國風，1971。
劉 鳳：《續吳先賢贊》，明萬曆原刊本。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台北：世界，1965。
藍吉富：《大藏經續編》，台北：華宇，1986。
顧起綸：《國雅品》，收入於周駿富《明代傳記叢刊》，第十六輯，台北：明文，1991。

論文

- 江燦騰：〈道衍禪師的生平與佛教思想〉，《史原》，第十七期，1986。

- 牧田諦亮：〈道衍傳小稿——姚廣孝の生涯〉，《東洋史研究》，第十八卷，第二號，1959。
- 姚廣孝：〈佛法不可滅論〉，周永年《吳都法乘》，收入於藍吉富主編《大藏經補篇》，第三十四冊，台北：華宇，1986。
- 馬書田：〈明成祖的政治與宗教〉，《世界宗教研究》，第三期，1984。
- 高春緞：〈何喬遠《名山藏》初探〉，《黃埔學報》，第三十一輯，1996。
- 陳高華：〈朱元璋的佛教政策〉，《明史研究》，第二輯，1992。
- 許淑惠：〈梵琦、道衍的佛教思想及其著作研究〉，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 商傳：〈明初著名的政治家姚廣孝〉，《中國史研究》，第三期，1984。
- 曾我部靜雄：〈明太祖六諭の傳承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十七卷，第二號，1957。
- 樂壽明：〈朱元璋與佛教〉，《學術月刊》，第四期，1983。
- 暴鴻昌：〈明朝對僧道的管理〉，《北方論叢》，第七十八期，1986。
- 龍池清著，李孝木譯：〈明太祖的佛教政策〉，收入於張曼濤編《中國佛教史論集》，台北：大乘文化，1977，pp：1-16。
- 龍池清：〈明初の寺院〉，《支那佛教史學》，第二卷，第四號，1938。
- 釋見曄：〈洪武時期佛教發展之研究——以政策、僧侶、寺院爲中心〉，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 David B.Chan. "The Role of the Monk Tao-yen in the Usurpation of the Prince of Yen", *Sinologica*, VI, 1959。

大乘菩薩道精神在明末清初的落實與發展

——以天然一系在嶺南（廣東）的發展爲例

中山大學比較宗教研究所

研究生：陶 迺 韓

內容提要：明末清初之際，曹洞宗天然一系於嶺表廣行教化，使得素有“罕信宗乘”之謂的廣東一時宗風大盛。曹洞宗天然一系的這種發展，一方面是清初佛教發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應對特定的時世人心，有其獨立與獨特性；另一方面上承晚明佛教復興之餘緒，可以視爲晚明佛教發展之延伸與推進；本文的主要目的和任務是在對大乘菩薩道認識的基礎上，來看晚明以來於憨山德清等人身體現的大乘菩薩道精神之於明末清初之際，尤其是清初，在天然一系行事活動上的落實和發展，以此提供一箇箇案的分析，並進而探求這種落實和發展的原因。

關鍵詞：明末清初 天然一系 大乘菩薩道 法施 叢林建設

一般而言，學界對中國佛教史或中國禪宗史的研究歷來存在着一種重前不重後、重思想不重行事的傾向。我們隨手翻閱一本含有“中國禪宗史”之類字眼的論著，總會很遺憾地發現，中國禪宗在唐宋以後尤其是明清以來的這幾百上千年的時間裏，幾乎處於一種尷尬而不起眼的境地。禪宗乃至於佛教在這一時期的發展，在一些長達幾十萬字的著述中，竟可以以寥寥幾萬字打發之，甚或幾乎可以略過不提。或者，有專門以“明清佛教”爲題的研究，一方面在長篇累牘地敘述明清佛教思想發展，另一方面卻不斷的發出諸如“陳陳相因”“無甚可述”這樣無奈的感慨。面對這種狀況，我們在感歎之餘，也不能不產生這樣的疑問：究竟唐宋以後佛教，尤其是明清佛教是怎麼一回事？其因循守舊、了無生趣、每況愈下的形象，究竟是因爲我們研究者諸如研究視角、方法之類自身的問題使然，還是由於這一研究對象本身確實如此衰敗以至於只能讓我們爲之悲歎悵惘？

所幸的是由聖嚴法師開啓之對晚明（明末）佛教的專題研究²，以一種貼近佛教自身發展理路和關懷的方式，爲我們展示出晚明佛教發展興盛的一面。聖嚴法師根據禪者著述之豐富多樣，進而指出如果把晚明佛教稱之爲佛教復興亦不爲過³。爾後又通過學者們多方面的不斷努力，或以晚明四大師研究爲中心，或以叢林改革爲重點，或從庶民信仰研究出發等等，使晚明佛教研究逐漸成爲一個研

¹ 天然，即天然函是，字麗中，廣東番禺曾氏子。生於萬曆三十六年（1608），卒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天然爲曹洞宗三十四世，嗣法於宗寶道獨，爲博山無異元來法孫。天然著述甚豐，法席興盛。其主要著述有《楞嚴經直指》、《楞伽心印》、《般若心經論》、《廬山天然禪師語錄》、《瞎堂詩集》等，《明嘉興藏》、《卮續藏》有錄部分著作。其門下嗣法有十人，號稱“十今”（今無、今觀、今摩、今釋、今壁等），其中以今無（1633—1681，崇禎六年至康熙二十年）和今釋（1614—1680，萬曆四十二年及康熙十九年）最爲突出。二者堪稱天然門下兩大龍象，對於推動天然法門在嶺南的發展極爲有力。二者各自著述亦可謂豐富，皆有語錄行世。今無主要著作爲《光宣台集》，今釋爲《禪行堂集》、《菩薩戒疏隨見錄》，具體版本可參看洗玉清《廣東釋道著述考》（載《洗玉清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天然門下弟子的行事活動大抵集中被記述在清代徐作霖等輯的《海雲禪藻集》（逸社排印，民國24年）中，該書也因此被稱爲雷峰志之一（“雷峰”，源於廣東番禺雷峰山，爲天然主要道場）。

² 釋聖嚴《明末佛教研究序》，東初出版社，民國81年版。

³ 同上，頁3